

福山放弃“历史终结论”了吗?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争论与思考

刘仁营,肖 娇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福山是否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这一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笔者以为,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一个步步退却的过程;尽管在直接表述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放弃”“历史终结论”,但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客观逻辑,他已经自我否定了自己的结论。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坚持和客观上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福山;历史终结论;金融危机;美国民主模式;中国道路;主观坚持;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B036/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5-0005-07

一、相关争论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世界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开始发生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人们开始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经济观和以美式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政治观进行重新反思和认识。饶有意味的是,这一时间距离曾经引起盲目崇拜西方价值观的 1989 年苏东事件,刚好 20 个春秋。彼时,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欣喜若狂,在各大高校奔走相告:资本主义的“福音”到来了! 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人类的极乐世界,就是人类苦苦追寻终于达到的“乐土”(福山语)! 人类历史也因此而停滞不前了。而那些仍然沉浸在两次世界大战悲观阴霾中的美国人,也遭到了严厉批评和嘲笑。然而,20 年之后的今天,面对影响深远的大危机,福山的思想又当如何呢? 他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观点,还是已经放弃了它呢? 一段时间以来,这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较多且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有人认为,福山的确已经放弃“历史终结论”观点了。例如国内学者张维为先生曾在撰文中引用媒体译文指出:“福山也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1]张维为先生所引内容出在 2009 年 8 月 20 日新华网的“新华国际”栏目文章《日刊:“中国发展模式”价值内核——集中高效》。^[2]这一内容也被国内其他一些学者转引。再如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参加英国《卫报》组织的一次网络论坛时也指出:“福山的问题是:从长远看,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认为,不幸的是,并不能。十分有趣的是,甚至福山

收稿日期:2016-04-11

作者简介:刘仁营,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历史终结论问题研究”(12CZX012),项目负责人:刘仁营;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社科基金项目“福山历史终结论再批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探索”(11ZX10),项目负责人:刘仁营。

他自己也不再是个福山主义者，他承认《历史的终结》过时了。”^[3]

也有人认为，福山根本就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观点。他们质疑和反对上述看法。例如刘擎在《东方早报》发文指出：一方面，“福山本人是否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似乎已经过时了的）历史终结论还有没有必要？”另一方面，他仍然费尽周折向在东京大学的友人王前请教，查证福山相关言论，最终认为福山在日本的那次演讲（发表于日刊《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观点。他说：“我们一致的看法是：那篇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也因此产生了某种误导倾向。”^[4]再如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赵信在该网站发表文章《福山“悔改”了吗？》质疑福山是否真的“悔改”了，认为这是一种“误读或篡改”，是“拉大旗作虎皮”打击异己，是虚弱与绝望的“救命稻草”。该文认为国内一些作者的“方法和态度”有问题，他们“请‘洋人’出来捧场”是在为执政党和政府唱赞歌，认为政府和官方学者应该反省自己的“宣传策略”^[5]。

那么，孰是孰非，福山是否真的放弃了“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呢？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注意这样几个前提：第一，不应该纠缠于福山的某一时间、某一地点讲话的内容，而应该将福山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讲话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分析。稍微对福山的著作和演讲做一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语言具有典型的“格林斯潘风格”，经常闪闪烁烁、欲言又止。这在客观上给理解他的思想增加了困难。第二，不应以二手资料为主要依据，而应尽量以一手资料作为分析对象。二手资料很可能因为译者或编辑的误解而造成信息传递上的误导。第三，不仅应该分析福山在不同文章和讲话中的基本观点，还应该分析他关于历史终结论的哲学前提、基本概念以及内在逻辑。第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应该把福山的观点表述、主观意愿与他的文献自身已经形成的客观逻辑区别开来。他的观点表述和主观意愿与他的政治立场、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福山语）紧密相连，而他的学术研究尽管最终是为政治立场服务的，但因为需要研究和思考现实而形成了一种具有自身特征和独立性的逻辑。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貌似刻意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理性的态度，但仍然掩饰不住某种政治立场的情绪化。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绝不是“已经过时”“没有必要”了。

经过分析，笔者得出这样一些观点：第一，就相关文章在中国的翻译和转述问题，可能的确存在“误读”，这跟福山在不同场合具有“最大程度实用性”的语言态度不无关系。但抓住这一点不及其余，不把福山的言论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则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不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第二，福山的确在直接语言表述上，从来没有讲过“已经放弃历史终结论”之类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间接表述和客观逻辑上没有“实际放弃”历史终结论。我们应该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不能只看表层的语言表述和直接表态。第三，就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言，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从伊拉克战争之后，便体现出步步退却的态势，这个退却现在仍然在进行当中；其二，就其基本逻辑和政策倾向而言，他“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下面就这些观点做些分析。

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步步退却

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1992年出版之后，世界陆续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例如9·11事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格鲁吉亚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国债危机和关门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等。在这些“强硬的事实”面前，福山的理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做出修正、退却。这种退却主要表现为与新保守主义切割和与美国自由民主模式撇清关系；重新肯定、重视和吸取中国实践的经验；对“历史终结论”的哲学前提进行调整，对其政治价值观和建设路径进行重新建构等不同方面。

（一）与新保守主义和美国民主模式撇清关系

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福山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他曾经积极地推动了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并且参与“上书”美国政府,力促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在为伊拉克战争寻找合法性理据中狼狈不堪的被动态势,逼迫他不得不逐步与新保守主义那种崇尚政治、军事的思维划清界限。福山愤愤地说:“促进民主本是件好事,但因其与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便遭到严重污染。”^[6]美国人一直标榜的民主理念因此而“早已蒙尘”。他曾经希望对新保守主义进行理念上的重构以保住这块“牌子”,然而无济于事。最终,在一种非常尴尬的表述中福山放弃了新保守主义立场。他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自我表白:从2004年夏开始,“作为一个政治标志和一种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某种我不能继续支持的东西……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7]。

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切割,仅仅是福山将“历史终结论”与美国政治制度撇清的第一步。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表现出的完全无能,新建的“民主政府”在国家治理上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福山的这一切割工作进一步发展为与整个美国政治制度的撇清。在与新保守主义做出切割的同一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再版后记”中自我辩护道:“我不想澄清的是关于流传广泛的误解,认为我是在主张美国式的历史终结,一个学者称为‘铃儿响叮当的胜利’。很多人认为历史的终结就是美国的世界霸权的缩写,不仅在思想和价值领域,而且通过实施美国的权力命令世界按照美国的利益运行。这真是天大的谬误。”^[8]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对外输出的两个基本价值理念——自由市场和美式民主的问题频出,包括福山本人在内的美国和世界学者开始反思危机原因,思考美国政治体制出现“否决政治”“金钱政治”等问题,上述理论切割和撇清行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10年12月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福山表示:“我想要重申一点,《历史的终结》一书和当时鼓吹美国霸权的政治背景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研究民主的一本书。”^[9]2012年11月在回答学者采访时,福山又说:“从始至终,我的观点都与美国本身没有关系。”“在我看来,美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与民主价值观是没有联系的。”^[10]显然,这种说法与他宣扬“历史终结论”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对美国的肯定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二)重新审视中国道路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十分简单的。他将其简单地看做是一个未来的苏东问题,认为中国的命运和苏东的命运不会有太大不同。他把中国在公有制前提下利用国内外资本的做法,看做是以资本主义为理想目标,对资本主义的直接照搬。在他眼里,中国是一个“革命对象”,而其要实现的“革命目标”就是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然而,后来的实践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实践证明,他颠倒了“革命对象”和“革命目标”。真正表现出制度优越性的,恰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2009年9月,当日本《中央公论》杂志记者会田问福山“历史终结”的看法有无改变之时,福山回答:“很难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国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的现代化取得很大成功。”^[11]2010年12月,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出打算如何修改观点之时,福山回答说:“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书中我对构建民主机制,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难度强调不够。”^[9]很显然,此时的福山已经不再像苏东事件发生时那样态度坚决,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福山明确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有严重缺陷,不仅不能保证形成强有力的执政能力,而且可能带来动乱和内战。福山做出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危机后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政治陷入金钱政治和否决政治状态;而中国尽管受到一定影响,但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稳定增长,国际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对提高。

(三)逻辑上的重构和退守

福山的退却不仅体现在重新审视美国和中国的历史意义,而且体现在理论认知的逻辑上。福山在逻辑上的退却,集中体现在2012年1月发表的《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

的衰落中幸存下来?》一文和 2013 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在前一篇文章中,福山认为“未来的意识形态”将发生这样一些变化:政治上,终结利益集团主导,使其成为公众利益的表达者,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国有部门,将其从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来;经济上,不再把市场看做自身完美的事物,全球化不再被看做不可更改的现实,而是应该进行小心的控制的对象,国际贸易目标不再仅仅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而且要突出促进中产阶级繁荣。^[12]在后一本书中,他尽管仍然坚持自由民主是历史终结的结论,但已经完全修改了原来的推理方式。原先,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本性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而精神的方面才是更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基于“追求承认”的精神本性而直接追求民主,经历一个主奴斗争的辩证过程,人类最终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普遍均质国家。福山后来承认,他的这个论证更多地带有哲学论证的特点,而对于政治运行和本性的本性,他是非常不清晰的。伊拉克战争之后,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促使他重新思考政治发展本性的问题。在此书中,福山将政治要素区分为民主、国家治理能力、法治三个方面,认为人类不能直接追求民主目标,而应该按照国家治理能力、法治、民主的顺序来进行政治制度构建。在还没有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构建和法治建设之前,是不能首先构建民主机制的,否则,会给国家带来混乱甚至动乱。他十分肯定中国国家具备的那种强大的执政能力,认为中国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这样一种现代国家治理体制。^[13]

福山不仅重新思考了原有逻辑中政治发展的本性和顺序问题,而且重新审视了其哲学基础。福山“历史终结论”最初的哲学基础是追求承认的精神决定论。对此,当中国学者李义天向他提出是否担心左翼学者批评其过分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问题时,福山回答道:“确实,人们有物质的需要和欲求,但他们同时也有理想,对于获得承认也有巨大的渴望。事实上,两者同样重要。人们希望自己的尊严获得认可,希望自己的理想得到更多承认。人类虽然是物质的动物,但也是精神的动物。”^[14]福山这种将人的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并列齐观的做法,已经与原本否定前者突出精神的做法不完全相同了。可以讲,其哲学出发点由精神决定论退回到了物质精神二元论立场。而在《历史的未来》一文中,福山甚至搬弄起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不只是‘决定’意识形态,但是,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那些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意识形态,就像意识形态变化会反过来造成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后果一样。”^[12]福山借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尽管更多地强调的是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也没有否定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这说明在福山的哲学基础中,精神决定论在退到二元论之后,进而开始向社会结构决定论退却。这个逻辑进程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从经济历史观到经济—精神二元历史观再到单一精神历史观的分析过程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三、福山客观上否定了“历史终结论”

福山在步步退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人们的各种质疑。在对这些质疑的回应过程中,福山的言语经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格林斯潘语言风格(外文称为“Greenspeak”),即讲话时故意回避问题,语意暧昧、模棱两可。对于这种语言风格,格林斯潘讲过:“我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回避问题,因为我担心自己说话过于直白。最后,我终于学会了‘美联储的语言’,学会了含糊其词。”^[15]福山兴许希望通过这种语言回答别人的质疑,然而,它却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质疑。这逼迫福山不断地在不同场合出来强调他的“历史终结论”信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 2014 年 6 月 8 日,福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历史终结时刻民主依然屹立》的文章,称自己的核心观点“一点也不错”。然而,笔者以为福山主观上是否放弃了“历史终结论”是一回事,而作为一种理论逻辑,客观上是否否定了“历史终结论”又是另一回事。福山也许在主观上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但在客观上,他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己的逻辑和结论。恐怕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坚持”和客观上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引发

了上述争论。

为什么说福山事实上否定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呢？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福山不断替换自由民主制度的“标杆国家”，“频道干扰”方法已无法达到论证的目的。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与现实国家制度之间，必须建立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相应关系，这要求福山为自己的理想寻找一个标杆国家。虽然这样做是带有赌博性质的风险行为，因为一旦这个标杆国家不再能够成为榜样，思想的根基就跟着动摇起来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标杆国家，历史终结论就会沦为脱离实际的乌托邦。一开始，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将英美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标杆国家。但即使在这一书中，福山的这种理想与事实的冲突也已经深刻地呈现出来：当现实无法证明自由民主理想时，他就退回到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告诉人们他的历史终结论只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历史事实的终结；当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无法产生现实影响力，而必须与政治经济现实挂钩时，他又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置换成一种历史事实的终结。这种做法被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批评为对读者搞不道德的“频道干扰”。福山一旦走上了这条逻辑之路，就再也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他只能不断地在历史事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翻来覆去。一开始的标杆国家英美，后来被替换成了欧盟。欧盟出现和美国类似的否决政治顽疾之后，又被替换成了“威斯敏斯特体制”即丹麦那样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这个不断重新寻找标杆国家的做法，不仅模糊了所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界限，而且告诉人们那种要证明的理想只不过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

为了解决这个方法论上的致命问题，福山先是把标杆国家推到不能确定的未来。在 2003 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这种“频道干扰”行为坦率地说成是无法确证的未来现象。他一边暗示人们“1989 年我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历史的终结？》，句尾带着问号，现在这个问号仍在那里，因为这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一边又告诉人们“即便我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看法是正确的，它也是一个基于长期的结论……你们可能会认为，我相当精明，说自己在 50 到 100 年之后将被证明是正确的”^[16]。后来，福山干脆告诉人们他的结论与现实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某种思想之上。2012 年 11 月，当中国学者王文询问福山历史终结的“价值体系”与美国之间的真正关系时，福山告诉人们历史终结论如果能被现实证明就证明，不能被现实证明也无所谓，因为它可以仅仅通过思想来证明。他说：“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当美国看上去发展得不错，它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的美国并不是很乐观……民主本身并不是建立在美国政策成功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民主思想上而言。”^[10]这无异于告诉人们，历史终结论只是一种在现实中无法证实的假设，因此不过是一个乌托邦。

第二，福山指出政治的发展永远是进行时，没有一种是放之世界都正确的制度。福山最近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在批评完美国和中国并把标杆国家改为“像德国、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那样的议会制”之后，对自己这种无休止替换标杆的做法做出了一个更深一步的评价：“这也说明，政治的发展永远是进行时，每种制度都需要演变，没有一种是放之世界都正确的制度，因为世界变化很快，国内国际形势都如此。政治体制也需要演变。”^[17]如果政治的发展永远是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那么“历史终结论”是否是政治发展的完成时呢？如果每种制度都需要演变，那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否需要演变呢？如果没有一种放之世界而普适的制度，那么福山为何支持美国对外输出自己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把它看做是人类历史的宿命呢？如果像《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那样，福山指出现有的发展、演变最多是一种改良意义上的修修补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想不会再发展和演变了，那么这种没有完成时的永无止境的量变怎么保证不会发展为一种质变呢？对于此处被当做标杆国家的德国和北欧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福山此前也曾给予了否定和批判：正是德国的民主制度滋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正是北欧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因违背自由原则而患上了“福利病”。可见，无论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标杆定为哪个国家或者推到遥远的未来，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福山不得不承认那种作为历史终结标志的普世制度在人间根本就不存在。如果

非要说存在,那只能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存在。

第三,福山指出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正在遭到破坏。2012年1月,在《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一文中,福山提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问题,并认为这一基础正遭到了破坏而处于衰落之中。他坦率地指出:“现在急需严肃的思想大辩论,因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侵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关于“中产阶级”的内涵,福山把它界定为“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既然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基础遭到毁坏,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命力。福山指出,事实上已有充分迹象表明这一动向已经抬头。例如,美国的平均收入按照实际购买力从197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停滞阶段,两极分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不仅没有收敛,相反更加拉大。很多人认为里根—撒切尔主义创造了一个更具竞争活力而无摩擦的世界,并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新的中产阶级,因此推动了民主在世界上的传播。福山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与其说这是过去30年的现实经验,“不如说只是一种信仰而已,现实经验显示的完全相反”^[12]。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处在衰落之中,这不由得让福山开始担心: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

福山的忧虑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建立于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之上。然而,这个逻辑对于福山而言,实际上从提出“历史终结论”的一开始就不是完全成立和值得信赖的。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在分析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之时,就曾经明确地指出:尽管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未必能够必然地、逻辑地得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个结论,因此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它只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站得住脚,即自由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教育这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也许在特定国家能形成中产阶级,但这个中产阶级未必能把这个国家带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当中。^{[18]139}因此,福山最终要求我们“最好不要相信马克思和受其经济历史观影响的社会科学体系”^{[18]154},而要相信黑格尔和科耶夫,从人类追求承认的精神角度解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产生。

早已被福山否定的中产阶级逻辑是否在后来被他遗忘了呢?不是。正是在《历史的未来》一文中,福山还明确地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原则上不一定支持民主: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自私,希望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得到庇护……民主也不一定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如果真地无法满足,中产阶级也会出来闹事。”^[12]既然中产阶级的逻辑压根就不能成立,那么“历史终结论”的依据就又回到了上述所谓精神决定论上,依靠所谓“民主思想”“信仰”来支撑。

第四,福山形成了以北约军事俱乐部为轴心的放弃民主推广的帝国梦。从理论渊源上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直接来源于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二者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家族相似性”:一方面,二者都在不断更换标杆国家。科耶夫选择的标杆国家先是苏联,后是美国,再往后又是日本。福山选择的标杆国家先是美国,后是欧盟,再往后又是丹麦。另一方面,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并不完全彻底,一旦他的新祖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他便立马放下由“普遍均质国家”构成的和谐世界理论,向法国总统呈上《法国国是纲要》,建议构建以法兰西为核心,以西班牙、意大利为盟国的“新拉丁帝国”,与以英美为轴心并且可能包括德国的帝国集团和苏联帝国集团进行抗衡和斗争。此时,国家和民族利益超过了以精神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目标。与之类似,福山也在美国利益受到新威胁之时向奥巴马提出了自己的新帝国战略。这一新国际战略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以北约军事组织为工具,与俄罗斯、中国等国进行斗争的新帝国战略。他批评奥巴马过多地强调恐怖分子的危险性,认为那是微乎其微的。他也认为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也不在话下,因为其经济模式有根本缺陷。相反,“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因此,为了限制中国,他认为“我们应优先考虑政治手段:将北约重振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

而不是民主推广俱乐部;同时建立一个同中国打交道的多边框架”^[19]。福山的这一做法和科耶夫一样,都暴露出其理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追求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霸权的意识形态武器,根本不是什么超国家利益的政治价值观。一旦其国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毅然决然地放弃虚幻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重新拿起政治和军事斗争武器。这种做法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历史已经终结的结论,回到了为物质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阶段。

福山尽管为了理论而曾经与美国这个标杆国家作出过切割,然而这种切割只不过是理论需要而做出的一种理论姿态,不可能割断福山对自己祖国的那种深厚感情。当苏东事件发生后,他抱怨美国到处泛滥的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希望他们对美国政治制度重新获得乐观和信任。然而历史就是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之前类似,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正在生成,这次陷入悲观的主角也将福山本人包括在内。面对日益陷入金钱政治和否决政治的美国政府,福山在2014年《外交》杂志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哀叹: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和“僵化”,除非“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否则“只有死路一条”^[20]。出于某种原因,他也许永远无法直接说出他“放弃”“历史终结论”,但这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他“事实上”是否做到了。

参考文献:

- [1] 张维为. 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J]. 求是,2014(9):47-50.
- [2] 刘瑞常. 日刊:“中国发展模式”价值内核——集中高效[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8/20/content_11914608.htm.
- [3] 斯拉沃热·齐泽克. 福山不再是福山主义者[EB/OL]. 赵超,译. http://www.guancha.cn/QiZeKe/2014_10_14_275662.shtml.
- [4] 刘擎.“历史终结论”面对的中国模式[N]. 东方早报,2009-09-20(B04).
- [5] 赵信. 福山“悔改”了吗? [EB/OL].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508? page=1>.
- [6] 福山. 美国霸权,难以为继? [EB/OL]. FT中文网,2008-09-2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2187>.
- [7] 福山.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前言 11.
- [8] 福山. 《历史的终结》之后[EB/OL]. 爱思想网,2006-05-29,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55.html>.
- [9] 叶慧珏. 历史没有终结——专访弗朗西斯·福山[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0-12-25.
- [10] 王文. 与福山喝下午茶[EB/OL]. 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11-1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495? full=y>.
- [11] 福山. 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J]. 中央公论,2009(9):68.
- [12] 福山. 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生存下来? [EB/OL]. 朱新伟,译. 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Western/2012_01_05_75437.shtml.
- [13] 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M]. 毛俊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14] 李义天,薛晓源,陈家刚. 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访谈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2):101-105.
- [15] 唐韵.“调音大师”格林斯潘[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3/25/20000724/157091.html>.
- [16] 福山.“9·11”之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 [J]. 国际政治研究,2003(2):22-27.
- [17] 福山. 没有放之世界皆正确的政治制度[J]. 环球时报,2015-04-23.
- [18] 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9] 福山. 谁在威胁美国核心利益? [N]. 金融时报,2014-06-30.
- [20] 福山. 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EB/OL]. 杨哈轶,朱新伟,译. 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4_10_12_275200.shtml.

责任编辑 刘荣军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